银发中国

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

作者： Richard Jackson
Neil Howe
翻译： 周健工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二零零四年四月

Prumerica Financial

目录

1 前言
2 介绍:中国将在老龄化之前富裕吗?
6 第一章:揭示中国老龄化挑战
8 人口转变
13 危机中的退休制度
15 “4-2-1”问题
20 第二章: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
20 从铁饭碗到空帐户
23 改革的新方向
27 第三章:老龄中国和老龄世界
32 关于数据来源的说明
33 引证提要
35 致谢
36 关于作者

前言

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正把中国引入一场深刻的人口转变。三十五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从现在起的三十五年后，这一关系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银发中国》探索了正在来临的老龄化浪潮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它警示中国，如果不准备充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期面临一场危机。正如这份报告所言，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主要局限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由于现收现付制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这一制度难以支撑。中国人绝大多数仍然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是由于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赡养网络不能发挥传统作用。中国人口中占更大比例的人口将步入没有依靠的晚年。

老龄化浪潮的挑战是巨大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由穷变富的巨变由此终止一假如中国选择明智的政策的话。《银发中国》认为，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将是这一解决方案的要害；它可以帮助中国照料起更多的老人，而不至于让年轻的工作一代承受过重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将变得更深更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将加快。

改革的攸关非常重大，如果中国不能应付老龄化挑战，其经济发展的未来将变得难以捉摸；如果中国克服了挑战，未来将更加繁荣，而且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银发中国》言简意赅地描述了风险与机遇。我们发现它内容丰富而又启迪思考，我们希望你也会有同感。

John J. Hamre
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Rodger A. Lawson
副董事长
保德信金融集团

中国能在老龄化之前富裕吗？

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如果我们把老年定义为六十岁以上，在2004年，老年人仅占总人口的11%。但是，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28%，这一比例比美国的还要高[1]（参见图1）。从绝对数量来看，正在降临的中国老龄化浪潮令人瞠目。假如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仍然持续，到2040年，中国老人总数将达到三亿九千七百万，超过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人口总和。

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增加，推动中国人口转变，也令世界各地的人口老龄化。然而，中国老龄化的速度非同寻常。在欧洲，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超过10%，直到2030年才会超过30%，这是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国人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跨越了。

中国如何跨越这一人口转变，攸关中国实现繁荣和稳定的发达社会的宏愿。从短期来看，趁着人口仍然相对年轻而且总量在增长，中国必须尽快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提高生活水平。从长期来看，它必须设法照料好庞大的老人群体，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又不至于增加纳税人负担和拖累家庭。

中国如何应对老龄挑战，将决定它能否变成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

当中国1978年推行开放政策时，它是一个几乎封闭的贫穷的国家。今天，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每年产出的电冰箱占世界总产量的20%，电视机占30%，照相机占50%。与此同时，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二十五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六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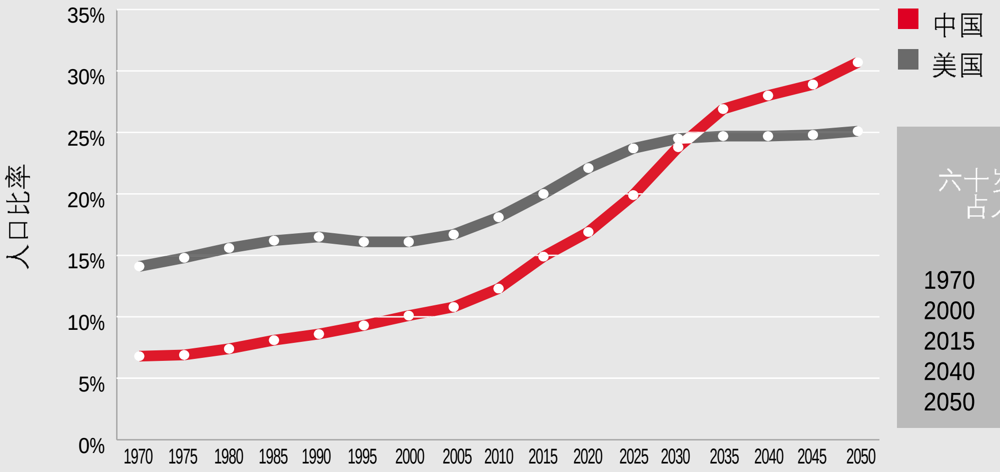
尽管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征途上也遇到了阻碍。国有企业改革引发了失业人数增加，甚至当国有企业的工人在私营企业找到工作时，他们再也得不到在旧的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2002年大规模的工人抗议示威活动在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各城市此起彼伏。市场经济也造　成了福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农民在抛离经济发展落后的乡村，涌向城市，令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坚持经济发展，否则的话，就会陷入一场社会甚至政治危机。消除债务、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创造就业抑制失业率膨胀，唯一的办法就是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是这样说的：“你必须不断往前，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如果停下，你就死亡了。”[2]

1.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人口假设。除非另外注明，本报告中所有预测都出自联合国2002年“恒定出生率”的假设。联合国的预测，以及所有其他有关中国人口、经济、和退休制度，都在本报告结尾的“关于数据及来源的说明”中讨论。
2.引自"Money Worries," *The Economist*, U.S. edition（2002年6月15日）

仅一代人之间，中国人口将比美国更老

中国和美国六十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率,1970 至2050 年间历史和联合国恒定出生率假设.



六十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率

	中国	美国
1970	7%	14%
2000	10%	16%
2015	15%	20%
2040	28%	25%
2050	31%	25%

来源:联合国(2003)

图1

今天多数劳动者根本就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

中国老龄化令实现经济发展成功更加迫切。改革以前，中国的国有和部分集体企业向工人们提供慷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福利。一旦国企改革，这一制度即摇摇欲坠。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多数今天的工人将是明天的退休人员，他们将根本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障。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依靠传统的养老保险：子女。但是当出生率下降，城市化离析大家庭，这一非正规的安全网正在解体。在中国，人口学家称之为“4-2-1”问题，许多家庭都指望一个孩子将来赡养双亲和双亲的双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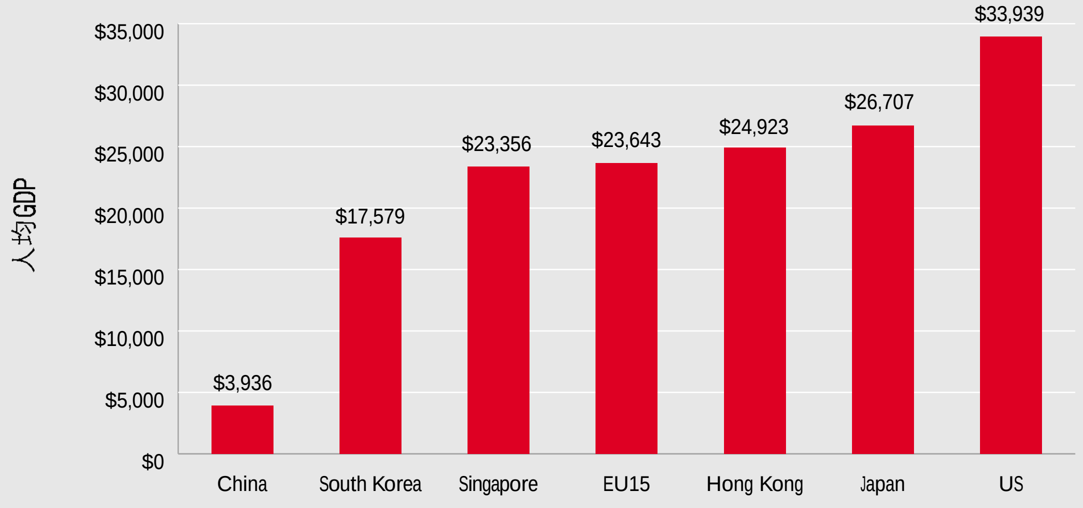
中国正在改革退休制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开始将养老保险向私营企业扩展。与此同时，它开始向新制度转变。在旧的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下，国家用当前工人的税钱养活当前的退休人员；新制度有两层：缩小的现收现付的养老福利和个人退休金帐户。然而，绝大多数专家指出，改革正陷入困境。私营企业抵制加入新制度，因为他们的缴费绝大多数都被用来支付国企的养老金债务。至于说个人帐户，根本就没有钱。中国各省市的社会保障部门经常用个人帐户资金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赤字。

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在老龄化之前成为富国

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在老龄化前都成为富国。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先于富裕的的大

尽管发展迅速,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按购买力平价折算成美元，2000 年人均 GDP 比较



来源:世界银行(2003)

图 2

国。尽管过去二十五年的经济增长令人称羡，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自从改革以来，人均收入可以说增加了六倍，但即使是考虑到购买力，仍然是韩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参见图2)。以现行汇率，中国目前的产出占世界GDP的4%，而不及中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占了全球32%的产出(见图3)。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00年，仍有二亿四百万中国人生活在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绝对贫困中[3]。

中国仍在准备迎接老龄化浪潮,它需要迅速果断的行动。下一个十年，人口形势还算有利，在中国严格人口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时，就业人口开始减缓增长，抒援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尽管老年人口增加，但增加数却不及新生婴孩的减少数目。然而，从2015年起，中国庞大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将开始他们的老年生活，形势将急转直下。如果中国届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的老年保障制度，中国想要管理这一人口转变而不至于引发广泛的经济困难，可能为时已晚。

最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是结合一个便宜但覆盖所有国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强制性加入的、真正资金做实的个人帐户制度。做实帐户的理由非常紧迫，从近期来说，资金充实的养老金体系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大和深化，是这是中国发展战略中最关键的下一步。从长远来看，它们对于保证老龄中国的储蓄率、投资水平和生活水平非常重要。好处不仅如此，资金做实的退体金制度，特别是个人帐户，令工人们分享改革的成功，有助于中国逐渐转向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

资金做实的养老储蓄制度已经迫在眉睫了

有些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推行一个资金做实的战略，而许多发达国家却仍然用现收现付

3.《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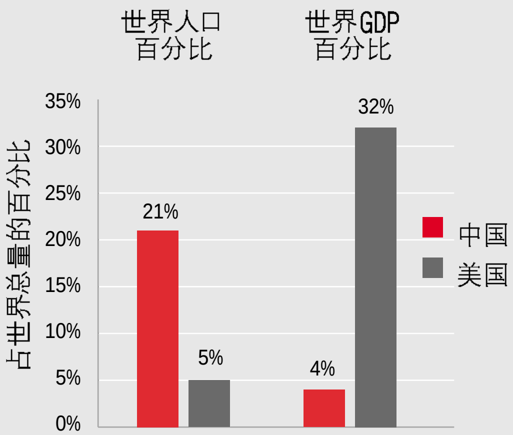
的养老金制度。答案在于，这一制度在人口日益老化时是不可能持续的，如果说它们现在还在沿袭，那是因为他们远比中国富裕。一个老龄的德国或者法国或者美国，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能够从工人的薪水中增加税收而不至于剥夺下一代人的财富。一个老龄化的中国却不能。选择非常简单：中国是愿意用工人们微薄的薪水赡养现收现付制度下的老人，还是想创造一个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去保制度晚年？

如果中国未能准备就绪迎接老龄化浪潮，它将在本世纪下半期面临一场危机

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从东亚到拉丁美洲，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带来同样的人口转变。尽管许多国家仍然有相对年轻的人口，在今后的数十年中，绝大多数国家将明显老化。尽管多数将仍然相对贫穷，它们将会努力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提高生活水平，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产出仅占世界GDP的百分之五

2002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较，人口和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来源：联合国(2003)
和世界银行(2003)

图 3

然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利害关系象中国这样重大。如果中国不能为老龄化的人口做好准备，本世纪晚些时候可能面临一场大危机。如果它能对付挑战，数千万的老人将免于贫困凄凉的晚年；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社会阵痛，从国企改革到大家庭的解体，更易于控制；年轻的家庭将通过财产的所有权分享中国经济；假以时日，老龄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有活力的成员，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

《银发中国》着墨于中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努力。第一章描述正在降临的人口转变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第二章细致分析中国最近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还讨论一些可行的计划。第三章将展现中国老龄化对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影响。

该报告为中国成功跨越这次人口转变提供了依据，但它也警告，改革之路上有许多误区和陷阱，时不我待，寻求并推行一个有效方案的时间越来越少。

揭示中国老龄化挑战

一个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35年前，八名年龄在15到59岁之间的成人赡养一名60岁以上的老人。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六名。假设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下去，再过35年，这一数字将下降到二名(见图4)。到那时，60岁以上老人的数目，是15岁以下儿童数目的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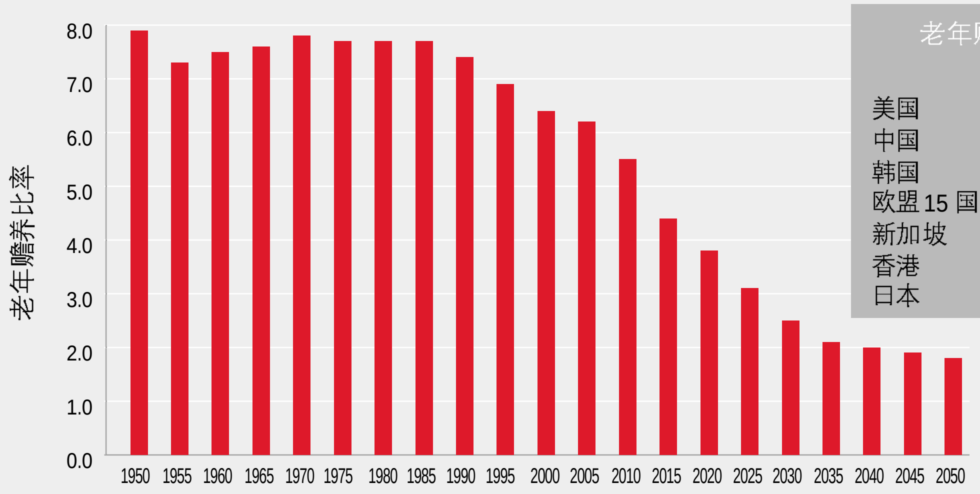
人口老龄化将测试中国的能力，看它能否赡养老年人，而年轻一代又不至于背负沉重负担

人口的迅速老化，将试探中国国家能力的底线，看它能否为老人们提供一个合理的生活标准而年轻一代又不至于背上沉重的负担。老龄化浪潮所带来的负担，一部分将体现在政府的预算和雇员的工资单上，它们已经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支出压力。但是老龄化的财政成本刚开始显现。家庭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唯一的安全网，更大的成本将会落到家庭。

如果说人口正经历着全面转变，迎接老龄化挑战要求人们的态度和期望经历同样的转变。今天的领袖们生于一个年轻人充沛的时代，他们担心的是人口增长的失控。自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七亿五千万，仅仅增加的人口，就超过目前美国总人口的二倍半。当今天的领袖们还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有一天要面对一个不仅是人口老化的中国，而且是一个人口收缩的中国。

赡养每个老年人的工作年龄成年人数迅速下降

工作年龄成年人(15–59岁) 与老人(60岁以上)人数之比，历史及联合国恒定出生率假设，1950–2050



老年赡养比率

	2000	2040
美国	3.9	2.3
中国	6.4	2.0
韩国	6.2	1.5
欧盟15国	2.8	1.5
新加坡	6.4	1.5
香港	4.8	1.4
日本	2.7	1.1

来源:联合国（2003）

图 4

但是，这正是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预言的未来中国。中国下降的出生率不仅重塑着传统的人口金字塔，在放大着塔尖的同时收缩着塔基，它还带来了一个总人口逐渐收缩的时代。中国的儿童人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经达到顶峰，从那以后减少了约七千五百万。它的工龄人口正朝着2015年的顶峰逼近；总人口直到2029年达到顶峰，但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的增长数目大于年轻人下降的数目。

人口转变

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但它在历史上基本上是一个人口年轻的社会。近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毛泽东号召全国的年轻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口的中位数年龄是20岁，意味着一半人口是儿童或者青年。老人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和自古以来的比例相当。

然而，在过去年几十年里，一场影响深远的人口巨变在蕴酿。中国人口迅速老化来源于两个最基本的力量：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第一股力量减少了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而第二股力量增加了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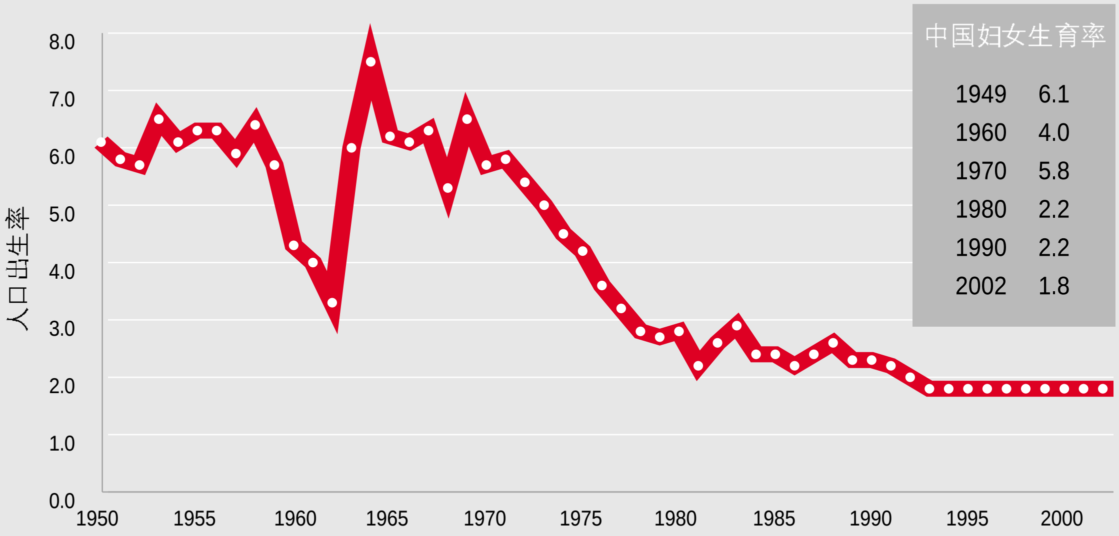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浪潮的两股基本力量

自从红卫兵时代，中国生育率明显下降。回溯到1970年，生育率是5.8，即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要生这么多孩子。今天，平均数是1.8，低于2.1，即能维持人口数长期稳定的出生率(见图5)。在生育率下降的时候，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改善导致人口寿命不断延长。自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口预期寿命已经从41岁延长到70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见图6)。

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既是其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也是政府人口政策的结果。生活水平在最近的几十年不断提高的同时，东亚各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政府严格的出生政策令出生率下降得更快。七十

中国老龄化浪潮的背后：妇女生育率显著下降

中国人口妇女生育率，1949–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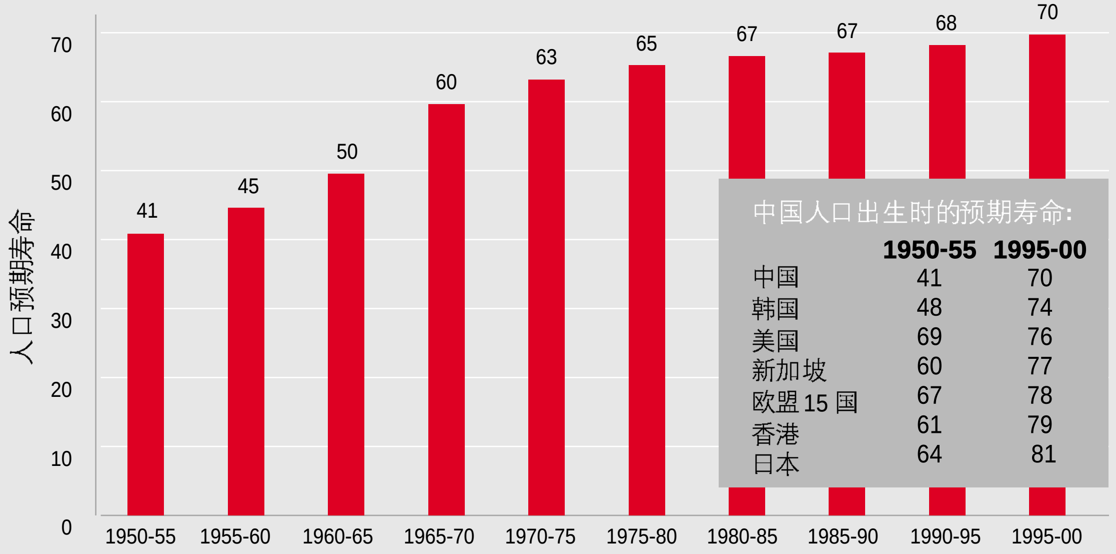


来源：国家人口及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同年份）

图 5

中国老龄化浪潮的背后：人口预期寿命同样显著上升

中国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1950–2000



中国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1950-55	1995-00
中国	41	70
韩国	48	74
美国	69	76
新加坡	60	77
欧盟 15 国	67	78
香港	61	79
日本	64	81

来源：联合国(2003)

图 6

年代早期，政府担心中国养活庞大人口的能力，鼓励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八十年代早期，“独生子女”政策开始推行，并且用一系列的准生证、人口控制目标、以及一系列惩罚措施来推行这一政策。

在农村，当地政府一般允许第一胎是女儿的家庭“再试生一个儿子”，所以生育率高于政府设定的一胎目标，尽管如此，农村人口增长仅能勉强达到人口替代率的水平。城市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更快，因为仅有福裕的家庭可以通过缴昂贵的罚款“购买”第二胎的出生权利，罚款的数目可能是有些家庭年收入的数倍。在北京和上海，生育率仅略高于一。

在北京和上海，出生率已经下降到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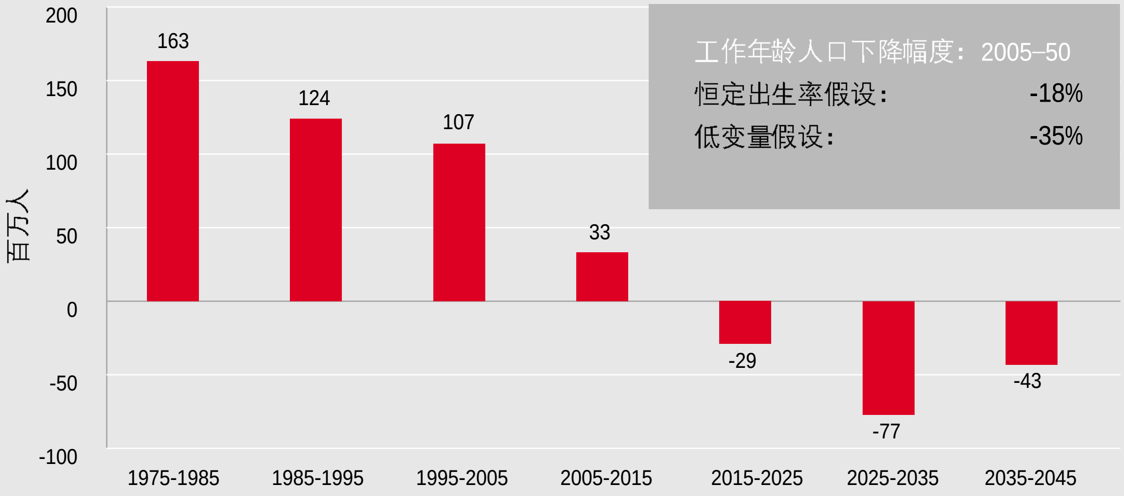
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或者说儿童潮一代，步入老年期，中国人口转变增加了新的含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战后婴儿潮暂时延缓了人口的老化。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婴儿潮，但它并不是婴儿生育率提高，而是死亡率降低的结果。尽管儿童成活率在五十代就开始显著提高，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育率才开始下降，其结果是家庭规模扩大。

随着这一扩大的婴儿潮一代步入三十到四十岁，中国的老龄化挑战仍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自从红卫兵年代，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已经从20岁显著提高到32岁。但这一提高主要反映在就业年龄成年人数的增加，而不是老年人数的增加。实际上，中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略有增长，现在处于1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20%。

目前来看，最大的挑战是为就业年龄的庞大的成年人群体找到工作。这一群体的人数每年增加一千万。而且，国有企业每年分离出来五百万职工。为了遏制失业率上升，中国每年必须增加一千五百个就业岗位，这约相当于美国经济九十年代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总和。而且，这一数字不包括每年离开乡村到城市找工的农民，所谓的流动人口群体正以每年五百万人数度增长，一些专家预

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将很快开始萎缩

中国工作年龄人口(15–59 岁)每十年变化，百万人，历史及联合国恒定出生率假设，1975–2045



来源：联合国（2003）

图 7

测，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更大。形势非常严峻，中国经济学家胡鞍钢警告说这可能导致“一场失业战争，人们为根本就不存在的工作而斗争。”[4]

然而，在中国劳动力大军背后的人口引擎已经开始放慢速度，并且将很快掉转方向。今后十年，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就业年龄人口将放缓增加速度，在劳务市场上取而代之的是今天规模要小得多的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出生的独生一代。实际上，联合国预测中国就业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然后下降(见图7)。到2040年，假如目前的人口趋势不变的话，就业年龄成年人口比今天减少10%，到2050年，会比今天少18%。即使就业年龄人口减少，就业压力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国企会继续裁员，农村劳动力会继续向城市转移。然而，劳动力过剩会逐渐减弱，在一些地区甚至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当婴儿潮一代在2015年左右开始退休时，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席卷而来

同时，中国老龄化浪潮会全面席卷而来。中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4年的11%，增加到2015年的15%，然后跃至2030年的24%和2040年的28%。与此同时，中国总人口中位数人口年龄，将从32岁提升到44岁。中位数年龄44岁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德国的中位数年龄已经达到42岁，到2040年将达到50岁，日本是43岁，将达到54岁。然而，中位数年龄44岁，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

而且，这一预测可能低估了中国老龄化浪潮的规模。目前中国真实的生育率一直引起争论。联合

4.引自Matthew Forney, "Workers' Wasteland," *Time International*（2002年6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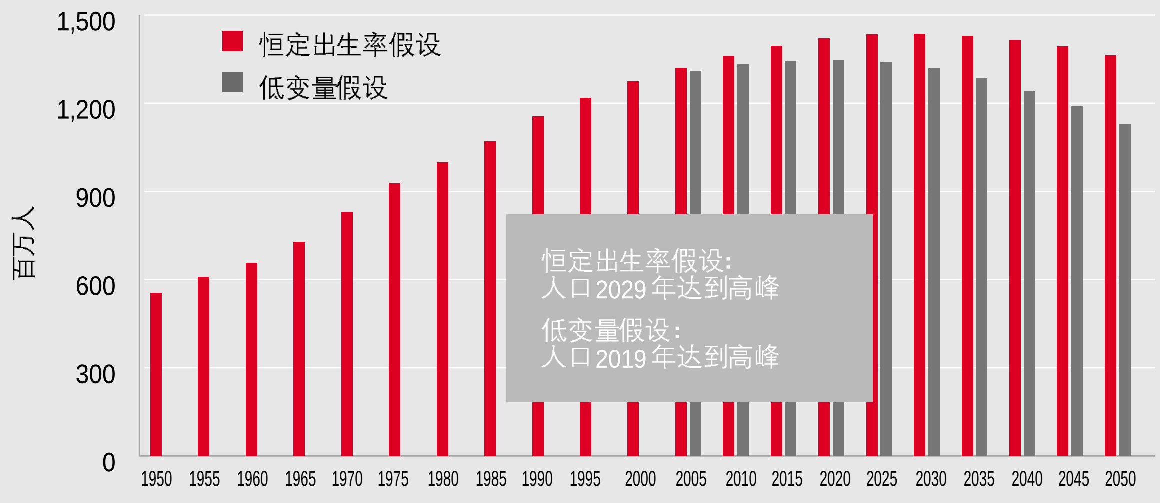
国估计现在是1.8，而且本报告从头至尾都假设1.8将会无限地持续下去。然而，据中国人口统计，当前生育率仅为1.3。所有的人口学家都认为这一统计数字太低，因为父母害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经常少报或不报新生婴儿。但他们也不同意少报的规模以及将向上调整的幅度。如果中国生育率现在低于联合国的估计，或者如果它将来会下降，老龄化浪潮将会比本报告估计得更加汹涌。

中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到2050年可能会失去约18%到35%

会有多严重呢？值得一提的是在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另一份预测中，假设生育率下降到1.35。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假设，但1.35正是今天新加坡的出生率，而且远远高于今天韩国(1.2)和香港(1.0)[5]。在联合国的“低变量”预测中，中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40年将攀升至32%(而不是28%)，仍然低于日本，但是与法国、德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将更快。到2050年，中国将失去现有就业年龄人口的35%(而不是18%)。中国总人口的也将更早至2019年达到高峰，然后会迅速滑落。(见图 8)

几十年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

中国人口，百万人，联合国恒定出生率假设与低变量假设的对比，1950–2050



来源：联合国(2003)

图 8

5.2002年数据。见"Demographic Fact Sheet,"香港立法院图书馆研究及图书服务处,参见网上www.legco.gov.hk

危机中的退休制度

中国对正在迅速增加的老龄人口准备得很不充分，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目前的退休制度仅顾及到一小部分人口，因为国有部门的改革，照顾面更加集中和缩小，而且正面临着财政困难。数千万今后五十年步入老年的中国人口将根本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家庭能让他们免于困苦，但家庭可能无法承担起这个赡养的重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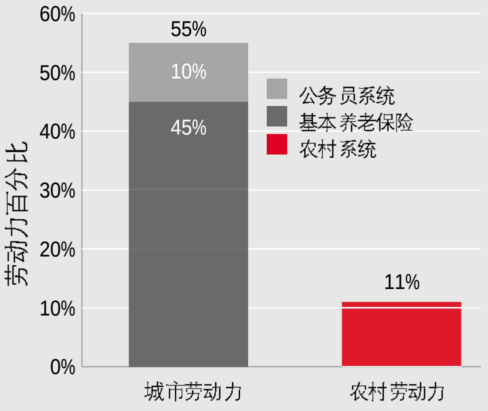
老龄人口迅速增加，但中国为此做出的准备很不充分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局限于经济中的城市国有部门，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6]。尽管政府已经开始把这一制度扩大到快速发展的私有部门，但参加者还微不足道。公务员约占城市劳动力的10%，有一个独立的和更慷慨的养老金系统。农村从业人员被排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尽管约10%参加了一个小规模的和自愿性质的农村养老金系统。总而言之，仅25%的中国劳动力，包括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参见图9和10）。另外，政府医疗系统局限于同一受惠群体，普及率比养老金制度略高一点。

在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公务员制度下的职工是幸运的，因为福利非常慷慨。对于目前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的工资替代率高于80%，公务员退休制度提供的工资替代率高于工资水平的90%。法定退休年龄仍然较早，女职工55岁退休，男职工60岁退休。实际上，多数职工退休较早。一些企业

甚至在城市，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没有覆盖几乎一半的劳动力

2002年
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中国城市及农村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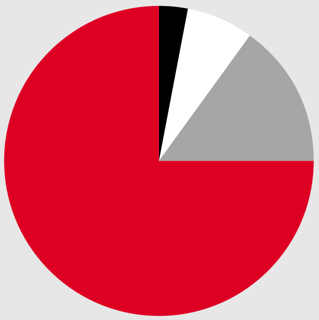


来源：劳动及社会保障部（**2003**）
及作者的计算

图 9

四分之三的中国劳动者没有养老金

中国被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人数
占总劳动力人数的百分比，2002



75% 没有覆盖
15% 基本养老保险
7% 农村系统
3% 公务员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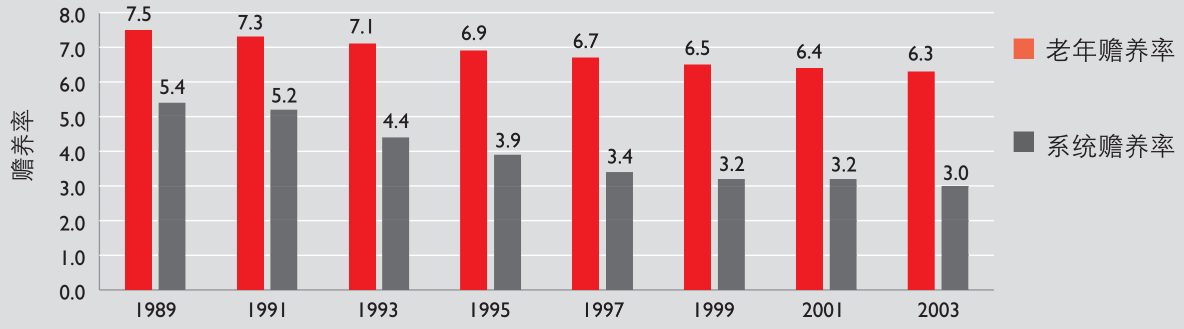
来源：劳动及社会保障部（2003）
及作者计算

图 10

6.2002年，中国有从业人员七亿三千七百万，其中三分之一，或者说二亿四千八百万被认为是城镇从业人员，在本报告中，所谓的城镇和农村从业人员的说法（而且一般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都是行政性划分，而不是经济学上的定义。最重要的是，除了农民，中国2002年的农村人口包括了一亿三千三百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他们的实际上做的是城市的工作，但顶的是农民的帽子。

中国的养老金系统比人口老得更快

工作年龄人口(15–59岁)与老年人(60岁以上)人口比率所构成的老年赡养率，
与基本养老系统中被覆盖的职工与的退休人员比率，1989–2003



来源：联合国(2003)和劳动及社会保障部(2003和2004)

图 11

让一些女职工早至40岁就退休，男职工早至50岁退休，被称为“40–50现象”。平均下来，在57岁时，一半所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男性职工已经退休。女职工的相应年龄仅50岁[7]。

然而，甚至在老龄化浪潮来临之前，国有部门精简正把中国的养老制度送入难以承受的地步。1989年到2003年，这一系统的现有供款职工和退休职工之比的赡养率，从5.4下降到3.0。仅仅是现有人口统计中所有就业年龄人口对老年人赡养率的一半(见图11)。在一些工业发达的省分，赡养率下降得更快，在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2002年的赡养率是2.4比1。在上海是1.8比1，中国总人口赡养比率到2050年之后才能低至这一水平。即使如此，恶化的情况可能会低估，因为仍有数百万已经被裁员的国有企业职工仍被计为缴费职工。

甚至在老龄化浪潮降临之前，国有部门的裁员已经令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入不敷出了

下降的赡养比率直接体现为成本上升。尽管各省缴费率有显著差别，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占了工资水平的24%，比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缴费率高出一倍。如果加上强制性的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总缴款率可达到工资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欧洲最慷慨的福利国家[8](见图12)。

养老金高缴费率正在导致大规模的逃避缴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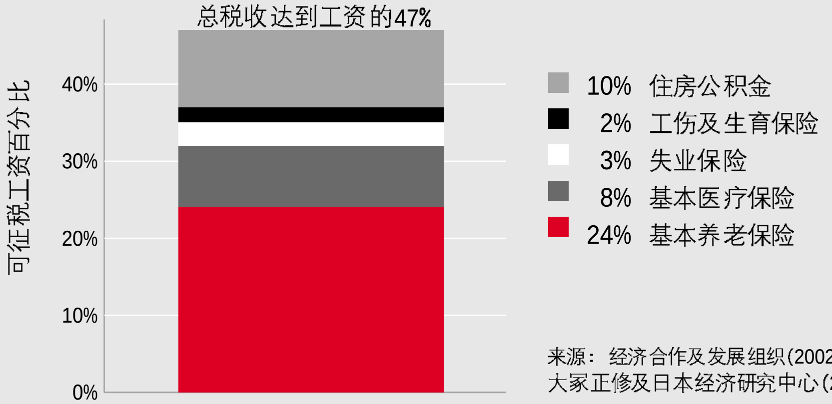
因为公共退休制度仅包括一部分劳动力，成本占整个经济的比例仍然很低。在2002年，中国花在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上的钱约为其GDP的3.5%，包括了公务员和城市基本养老保险。用于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约占GDP的0.5%，使整个公共养老保险的福利支出占GDP的4%。尽管退休福利仅占中国GDP相对较小的份额，却是职工和雇员的沉重负担。高缴费率导致基本养老保险系统的高逃避率，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7.高山宪之,"Pension Reform in the PRC: Incentivse, Governance, and Policy Options,"文章发表在亚洲发展银行学院五周年研讨会上(东京，2002年12月5至6日)

8.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2）；以及 *Impacts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Reform*（大塚正修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2）

中国工资税率接近50%——达到了欧洲最慷慨的福利国家的水平

目前中国各项社会保险缴费率占可征税工资的百分比



来源：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2002)和
大家正修及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2)。

图 12

在中国农村，多数从业人员仍然依靠大家庭养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为退休从业人员建立了一个退休储蓄系统。然而，这个自愿加入的系统规模小、完全建立在谁受益谁缴费的基础上，包括面非常小，在2002年仅是农村劳动力的11%。缴费更是微乎其微，多数参加者缴费达到最低限度的每月两元钱，或者说相当于25美分。总缴费仅仅是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总额的1%。除了养老保险，还有针对农村赤贫老人的救济，包括那些没有亲属、没有收入、没有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但是这些都非常小。目前，接受各种政府救助的农村贫困老人不足10%。

尽管养老保险在中国农村一直很少，不久之前，许多人还能得到非常基本的医疗保障。在上个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有著名的"赤脚医生"制度，十有九个农民可以通过国家补贴的诊所享有医疗保险服务。这些诊所最先由中国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后来却成为经济改革的牺牲品。在八十年代农村集体组织被解散后，大多数诊所关闭。到1998年，也是可能得到数据的最近一年，不足10%的农村居民能得到政府补贴的医疗保健服务。[9]

中国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自费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受损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尽管城市劳动力中享有政府医疗保险的比例一直稳定，不断上涨的医疗成本不能保证原有的报销水平。在1990年，中国家庭用于医疗的费用中仅有36%需自己付费，到2002年，家庭负担的医疗费用达到58%，这对于正在老龄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好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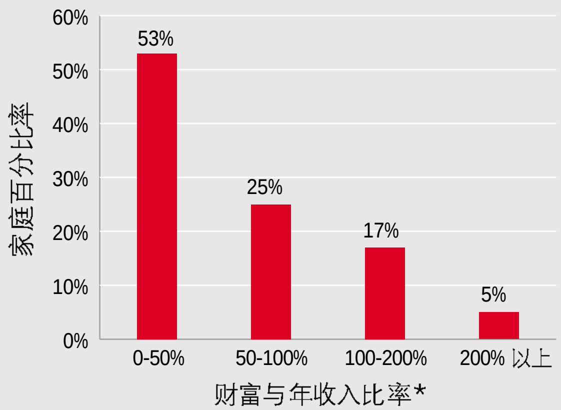
"4–2–1问题"

对于多数没有公共退休福利的中国人来说，其他的赡养来源非常有限。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储蓄，达到GDP的40%，老年人中却鲜有能指望个人财富来弥补缺口的。家庭储蓄仅是总储蓄的一小部分，而且许多都用于购买房屋。至于说金融储蓄，尽管中国

9.《国家卫生服务研究——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99年）

只有一小部分中国老年人可以指望个人储蓄支撑退休生活

1995 年中国城市五十五岁以上家庭财富与收入比率
家庭百分比率



* 金融资产占年收入的百分比
来源：高山宪之(2002)

图 13

购买人寿保险及投资新兴的股票市场的家庭不断增加，多数仍把钱存在回报很低的银行里。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在55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中，不足四分之一的拥有金融资产超过其年收入。仅有5.4%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超过其年收入的两倍，这个数目不足以支撑平均超过二十年的退休生活[10](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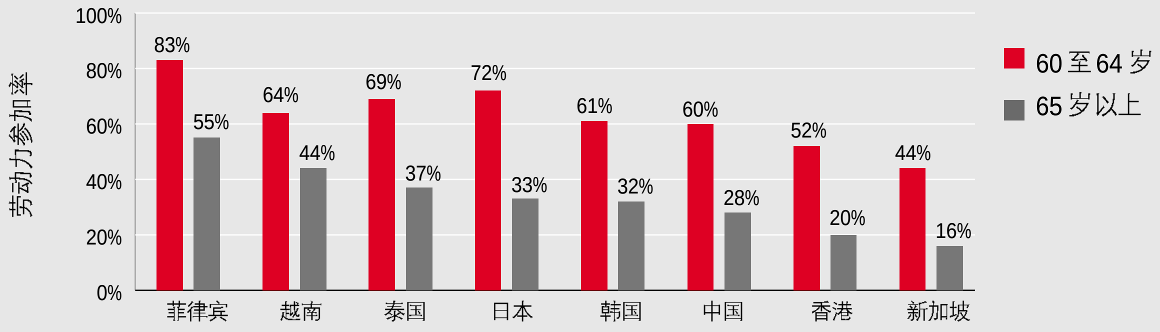
多数老年人也不能指望私人养老金来补缺共公福利。尽管已经有了雇主发起的养老金计划，但仍然稀少。在九十年代末期，政府让雇主选择建立被称为“企业年金”的补充养老年度，但却不向其提供税收优惠，而且将资格限定在已经交纳了基本养老保险金的企业。到2000年底，仅有六百万职工参加这一新计划，不足中国劳动力的百分之一[11]。

到2000年，中国劳动力中享有雇主发起的补充养老保险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持续工作也是积累养老福利的一个选择，但中国老人就业参加率在过支几十年里一直下降，现在比多数东亚国家要低。中国65岁以上的男性老人中，仅28%还在工作，这个数目甚至包括仍在自己家的田地里劳作的农民。菲律宾与中国几乎处于同一收入水平，这一比例是55%（见图14）。尽管中国日渐老迈的婴儿潮一代中许多人会比今天的老人工作时间要长一些，他们也会发现很难与更年轻、更健康和受到更好教育的一代竞争。许多中国婴儿潮一代年轻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丧失了整个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老人，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在和小青年们争一些体力活。

与其他亚洲国家比，中国仍在工作的老年人较少

2000 年一些亚洲国家不同年龄层老人参与工作的比率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04)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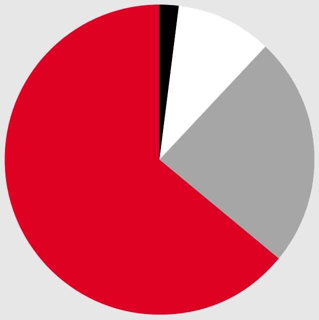
10. 高山宪之，同前引述
11. John B. Williamson和郑兵文，"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Model for China,"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XI:3(2003年6月)

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说，唯一免于贫困的依托就是家庭

对于多数的中国老人，唯一的依托就是家庭。在中国社会里，孝道要求子女照顾双亲，而且多数子女做到了。据2000年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65岁以上的老人中，64%与子女住在一起(参见图15)。在农村，这一比例要比城市高一些，而且在耄耋老人中的比例比较年轻的老人的比例高。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有80%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甚至当老人们不与他们的子女生活在在一起时，他们也会经常在经济上依赖子女，至少在农村是如此。据一项对农村家庭的调查，年龄在60到64岁的老年人，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子女，到75岁和85岁时，这一比例提高到75%和90%[12]。

中国大多数老年人与子女生活在大家庭里

2000年不同生活安排的中国老人(65岁以上)所占比例



来源：曾和王 (2003) 图15

当中国现代化时，它的非正规的老人赡养网络受到影响。年轻人从乡下涌入城市，使农村老人无法依赖子女。同时在城市，由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大行其道，城市老人也从传统的社会地位上冷落下来。尽管数代人共居的家庭仍随处可见，却不及十年前了。1996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老人，这是一个孝道不行的危险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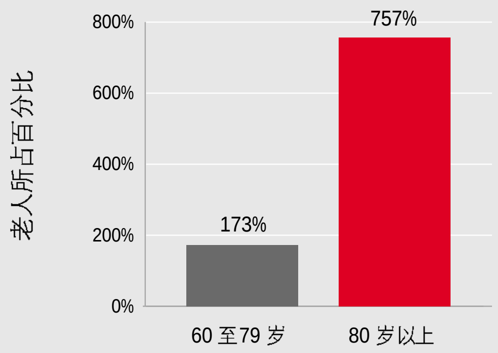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非正式的赡养系统将不得不遭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首先，农村年轻人持续涌入大城市寻求机会。平均来说，大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估计至少有二亿农民处于失业状态[13]。2001年，城市居民占中国总人口的37%。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14]。涌向城市的年轻人多于老年人，中国农村将比城市老龄化得更快。正如美国的大平原地区，中国农村的大片地区，可能会有朝一日遍布着居民几乎全部是老人的集镇和乡村。

除了移民，家庭规模的收缩也构成了一个挑战。今天的老年人在中国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建立家庭，通常有四到五个孩子分担赡养。但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将会很快改变这一切。据中国人口学家乔晓春的估计，今后五年中，年龄将达到65岁的城市妇女，平均生了三个孩子，而农村妇女平均出生了3.7个孩子。在接下来不断步入老年的群体中，平均每个老年人生下的孩子的数目不断下降。到2025年，城市妇女达到65岁的均仅出生了1.3个孩子，农村妇子平均出生2.2个孩子[15]。今天被娇惯的“小皇帝”们，终有一天会发现他们行孝道负担实在太沉重。

12.乔晓春,"Aging Issues and Policy Choices in Rural China,"文章发表于世界人口科学研究联盟第二十四届人口大会(萨尔瓦多，巴西，2001年8月20至24日)
13.*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2)
14.*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联合国人口署，2002)
15.乔晓春,同前引述

高龄老人将是增长最快的一群

不同年龄层的中国老人所占百分比的变化，
联合国恒定人口出生率假设，2000–2050 年



来源：联合国（2003） 图 16

到 2050 年，近一亿中国人口年龄超过 80 岁

还有被人口学家称为老年人高龄化的现象。中国 60 至 79 岁之间的老人在 2000 年至 2050 年间增长几乎三倍，与此同时，80 岁以上的老人数目将增加八倍（参见图 16）。这一趋势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瘫痪的老人的比例也持续增长。在 65 岁到 69 岁的中国老年人中，仅 5%有困难从事一样或多样基本的“日常活动”，如穿衣做饭。对于年龄在 80 至 84 岁的高龄老人，这一比例达到 20%。对于 90 至 94 岁的高龄老人，这一比例高达 40%[16]。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不仅会有更多的老人要照料，而且这些老人会更衰老、更孱弱。这是对中国家庭能力的一个极大考验，因为今天在中国还几乎从未听说过有敬老院。8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不足 1%的人被一种赡养制度照料着，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美国是20%。但是如果家庭不起作用，一大批新的赡养基础设施还有待于建立起来。到 2050 年，中国将有九千八百万人年龄超过 80 岁，比今天全世界的总和都多。

最后，还有中国“丢失的女婴”问题。在一个正常的人口中，每 100 个女孩匹配 105 年男孩。据 2000 年人口统计，目前中国的性别比例是 118 个男孩对 100 个女孩。这一不均衡是当代社会中最大的，也是中国独生子女 政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还部分反映出家长瞒报女婴，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但这一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是流产女婴甚至弑害女婴的结果。尽管这是非法的，农村流产女婴的行为相当普遍，不仅仅是因为家长们需要一个儿子去帮助种田，而且是因为儿子被指望养老。当性别比按出生次序计算时，第一胎得到不儿子的夫妻显然会绝望。对于第一胎，比例是男 107 对女 100，到了第二胎，性别比是男 152 对女 100。

人口学家称呼他们是中国丢失的女孩，这对于一个儒教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应该结婚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妇女担负起几乎所有照料的工作。今天，“光棍村”已经在中国贫穷的陕西、宁夏和广西出现了。为了应付新娘短缺，来自朝鲜和越南的新娘形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而且其中有些是走私和绑架的新娘。

中国新娘的短缺，将逐步演变成担负照料责任的家庭主妇的短缺

一些观察者担心，中国社会中本来已经酝酿着对失业、社会保障网的解体、和收入差距的不满，新娘短缺会火上浇油。过去性别失衡有时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暴发的捻军起义，起源就是一伙光棍汉抢劫造反。然而，比新娘短缺更糟糕的是正在出现的媳妇短缺。今天的新娘短缺，终究会成为明天家庭主妇的短缺，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尽管儿子承担起赡养年迈父母的责任，实际上上媳妇在照料。

16 曾毅和王正联，“Dynamics of Family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New Lessons from the 2000 Census,” *The China Review*, III:2（Fall 2003）

退休制度改革的长征

中国正在开始迎接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建立起一个覆盖面更广、经济上承受得起的退休制度。从九十年代末起，它开始把基本养老制度向城市私营部门扩展，与此同时，它正在推行一个计划，从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一个新的制度，包括缩小的现收现付制度和个人帐户。

不幸的是，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私营企业不情愿加入这个新的养老金制度，缴费负担沉重，而且被用来支付旧制度下的欠帐。到2002年止，私营部门的员工中十有九个没有任何养老保险。同时，各省市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个人帐户，并没有储蓄资金，也没有投资。职工的缴费被简单地视为税收收入，并被用来支付养老金制度中现收现付那一部分。

成功的养老政策呼唤更大胆的改革

解决这些问题将要求更大胆的步骤，但这超出了中国政府迄今为止的意愿。为了保障新养老金制度下的福利能承受得起，中央政府必须准备直接负担起旧制度下的债务。为保证个人帐户真正做实，还要逐步把个人帐户的管理从社会保障部门转移到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它还要对付在农村建立起老年安全网的巨大挑战。

本章详细分析中国走向退休制度改革的长征，介绍中国近期养老金制度改革，并解释为什么会遇到麻烦，然后讨论一个可行的方案。

从铁饭碗到空帐户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职工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有企业保证每个职工一生的社会福利，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等。中国的“铁饭碗”基于工作单位，但由政府支持。工人们对他们的国营企业有信心，因为政府在补贴国有企业。

当中国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时，它实际上是在拆除原有的社会安全网。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政府要求他们自负盈亏，养老金也是如此。每个企业实际上自己设立一个微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制定自己的缴费率和退休福利。不可避免的是，一个企业对职工的福利承诺，取决于其财务状况。亏损的企业往往拖欠和取消养老金，令数百万退休职工陷入贫困。

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国务院开始改革社会安全网。第一步是建立地方的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征收和“互济”国企养老金缴费。设立互济有几个目的。它能让社会保障部门重新设立缴费和福利标准。它还帮助国企改革，因为职工们可能在不失去养老金的情况下从亏损企业到盈利的企业，只要他们仍然在地方的互济系统中。退休安全得到

了提高，因为退休人员的福利不在依靠单个企业的盈利状况。

到九十年代中期，显然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需要援助，以避免近期的财政破产。

然而，仅靠互济并不足以解决日益恶化的养老金危机。当国企裁员时，其人口构成也迅速恶化。年轻职工(他们对失去养老福利不是很在意)倾向于进入私营部门，而年长职工和退休人员(他们更在意福利)愿意留在原有的国有企业。如果不采取解救措施的话，这个制度短期内会面临财政瓦解。与此同时，领导人们开始意识到长期的老龄化挑战。在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大量咨询外国养老金专家的意见。它否鼓励各省展开养老金改革试点工程。在1997年，国务院勾勒出了一个新的全国养老金制度，似乎意在解决短期和长期存在的问题。

1997年改革首次明确提出要把私营部门的员工包括到基本养老保险中。原则上说，新制度由一个缩小的现收现付制度和个人退休帐户构成，并用来取代旧制度。这一转变自然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些在1997年已经退休的是“老人”，在改革过程中他们仍然享受改革前的福利，养老金相当于其工资的80%。“新人”是指那些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他们享有相当于其工资20%的现收现付福利，还有一个个人帐户，政府估计这一部分将能提供的福利约相当于其工资的40%。“转型人”是那些在1997年时仍在向旧制度缴费的人，他们将从两个制度中各获得一部分福利。

新制度的缴费标准是工资的24%，但在不同的地区间有很大差别。缴费分成两大部分：13%的工资记入“社会互济”部分，用来支付第一层福利，其余的11%记入个人帐户。另外，雇主设立一个自愿的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可以交纳不超过雇员工资的4%。当地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社会互济和个人帐户，在某些地方，还包括企业年金。

改革显然是吸纳新人的缴费进入养老金系统并用他们的缴费来帮助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员工中年轻人占很大比例，他们在能有权享受福利之前，要缴纳多年费用。甚至个人帐户，当初被保证说是个人储蓄的一部分而且会有高回报，也被用来吸引新缴费人。但是改革还是一个重大步骤，用来解决老年赡养的挑战。私营部门1978年之前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占了城镇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占城镇经济产出的比例更大。把他们排除在体制之外，从长远来看不合情理。

然而，扩大覆盖面却遇到了抵制。政府在说服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加入新养老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如果那些企业不参加的话，政府可以收回营业许可。但是，总的来说，结果令人失望。到2002，私营部门中的覆盖面仅有6%。在一些城市里，当地政府试图通过降低缴费率提高私营部门和民工的参加率，但目前为止效果很有限。而且，逃避缴费绝不局限于私营部门。那些加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国有企业经常少报或少缴费，而且情况在恶化。

政府把养老金覆盖面扩大到私营部门的努力遇到了挫折

逃避缴费四处泛滥，主要是因为这制度的成本太高。对于新加入者来说，他们现在被要求缴工资的24%，但是从他们被承诺的福利标准来看，可能仅需要缴一部分，甚至一半，就足以支付将来的福利了。缴费率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加入新制度必须为没有资金的旧制度付帐。实际上，政府要求来自私营企业的新人们支持两部分退休人员：他们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正

是这部分人享受着非常优厚的福利，而且年龄都已经偏大。人们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拒绝加入。

1997年改革方案中提出了个人帐户，其结果是根本就没有资金

1997年的改革未能把个人帐户做实是另一个令人不满的原因。正如后来所发生的，地方政府对于"借用"个人帐户里的资金支付社会互济部分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法律甚至没有一个程序来阻止政府使用这部分资金，因为向两个层面的缴费存在地方政府的同一银行帐户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福利总额，超过了社会互济缴费和和个人帐户缴费收入的总和，造成了整个制度的赤字，约相当于福利成本的10%，必须由政府补贴来承担。个人帐户的缴费仍记入职工的帐户上。但帐户完全是"名义"的。正如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它们仅代表对将来税收收入的索取权，但并不是可以用来为将来的退休福利提供资金的真实资产。不幸的是，职工们把缴费视为纳税，这进一步加剧了逃避缴费。

同样的原因也有助于解释中国农村养老金系统未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该制度完全由受益人自愿向个人帐户缴费。正如为城镇就业人员设立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中的个人帐户层面，农村帐户也是由当地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农民的精明不亚于工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缴费实际上是税，纷纷追辍离这个制度。在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刚开始时，覆盖面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但很快就开始缩小。

政府已经日益关注到中国人所称的"空帐户"问题。2001年，国务院在辽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试点，意在做实个人帐户。该工程把养老保险的管理权集中到省级政府，它还建立了分隔个人帐户和社会互济之间的"防火墙"，将不同的缴费存入不同的政府银行帐户。在这些程序改革的同时，辽宁省接受了大量的补贴，用来支付基本养老保险成本。这一试点工程是否成功，专家们意见不一。然而，如果说它是可行的，那也仅仅是因为有政府补贴而不是因为有防火墙。辽宁省城镇劳动力仅占全国城镇劳动力的3%，但是2001年接受了约12%的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补贴。如果没有补贴，很难说防火墙如何能阻止辽宁省动用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归根结底，这些钱仍然由政府征收、管理，实际上由政府拥有。

辽宁试点工程能够成功，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

辽宁试点工程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国务院考虑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其中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企业年金的缴费应该享受税收优惠。另外一点，却把改革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额从占工资的24%增加到28%，绝不可能吸引更多企业参与。长期来看，更高的缴费率应该为新参加工作的人们提供更高的第一层工资替代率。从短期来看，它指望能筹得更多的收入来向目前的退休人员支付福利。然而，政府还需要明白，提高缴费率和征收缴费是两码事。

许多西方人会非常诧异，象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居然也会发现征收工资税会这么难。但事实上，政府是不可能迫使不情愿的企业加入养老金制度的。中国经济的"正规部门"主要是由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合资和外资企业，政府经济缺乏准确的商业和就业数据。而且，地方社会保障部门，无权将不服从的企业告上法庭；尽管可能施加行政处罚，政府却没有手段去征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唯一可能导致改革成功的办法就是给工商界和员工们真正的好处，吸引他们参加。

改革的新方向

中国的老龄挑战非常艰巨。一代人的功夫，一个年轻的国度变老了。现代化迅疾的步伐，离析了传统的老人赡养体系，令人口转变更加复杂。政府已经采取重大步骤来支撑这个安全网，但改革并不成功。过高的缴费率令养老金制度不堪负重。它向职工们保证有资金的储蓄，却给他们留下空帐户。与此同时，尽管成本负担沉重，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一个发展迅速但仍然贫穷的中国，如何能设计一个退休制度，能照料明天的老人，而双不至于令今天的年轻人过于沉重？怎样才能兑现1997年的改革方案？

养老制度的基础，应该是让所有的老人都有一个免于贫困的保护底线

退休制度的基础，应该是一个令所有老人都免于贫困的普遍受益的制度。至少，应该为城市和乡镇企业的所有职工设一个底线。然后逐渐扩大到所有的农村劳动力。底线应该能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也就是中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第一层的替代率。在这一层面上，保护的底线要么高于中国政府为城镇居民设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高于世界银行所设的每天收入一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这一底线应该从工资税收中扣除，而且是现收现付的，将是老人的第一道贫困防线。

为保证广泛参与，缴费率必须合理。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国营企业的养老金债务。1997年改革的教训是明显的：新养老金制度中背负旧制度的债务，必然导致大规模的逃避缴费。一个老龄化的中国不能为了改革国有企业拿退休制度改革当人质。国有企业改革的遗留成本是集体的问题，应该由各级政府的税收来解决，而不是用职工的工资缴费。

国有企业遗留成本社会化是必要的、公平的、可以承受的。

让国有企业的遗留成本社会化是必要的、公平的、可承受的。确实，中国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行动。2000年，它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用来补贴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互济。这一“最后保障的养老金”资金全部来自政府收入。政府的资金来源还倚重出售国有资产。2001年6月，国务院宣布计划出售国有股份为社保基金筹款。这一消息引发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下跌，政府不得不中止这一计划。从那以后，它开始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出售国有股，将所得收入的一部分划归社保基金。

如果国企业拍卖不能筹得足够的收入，政府可能要提高入息税。尽管这是一个负担，但由更广泛的纳税人承担，因为中国的GDP在增长，负担将会逐年下降，而且旧制度的受益者越来越少。发行债务也是一个选择。当智利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用个人帐户开始取代现收现付制时，它向当时的员工和退休人员发行了总额相当于其已经积累的福利的“承认债券”。然而，中国应该慎重让其隐含的养老金债务明晰化。当智利改革时，政府有大量财政盈余。而中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尽管其官方的债务与GDP比率相对较低，到2003年底仅为GDP的28%，但这一数目没有计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据估计，帐外债务可达到GDP的30%到60%[17]。

17. Syetam Hansakul,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Main Challenges* (Deutsche Bank Research, 2004年1月9日)

除了为老人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贫困防护底层，中国需要一个强制性的补充养老金制度，让老年人享有接近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一目的，资金做实的养老保险比现收现付制有许多优势.在资金做实的制度下,职工的缴费可以产生相当于资本的回报率，比在现收现付制度下的缴费要高得多,特别当人口正在迅速老化时.不仅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能提高人均收入,还能令资本所有权民主化,帮助培养中产阶级节俭和克制的价值观.这样一来,能增加职工加入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性，从而为现收现付制带来更多的缴费收入。

为了实现真正的储蓄，个人帐户的资产必须实现独立管理。

问题在于要保证资金做实。1997 年的改革还供了一个教训: 只要个人帐户缴费是政府拥有和政府管理的，政府就可能动用它们。为了保证实现真正的储蓄，职工们应该对他们的个人帐户拥有明确的产权。与此同时，基金的管理应该转移到独立机构。让我们明确一下：这并不是建议把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私有化。做实帐户里的资产将归个人所有而且由独立的机构管理。然而，这一制度仍属于公共社会保险，而且由政府组织和监管。

政府将不得不克服主要的行政障碍，以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在地方层面上，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能将职工和雇员的缴费导入基金管理机构。在全国的层面上，需要有一个中央监管机构认证基金并建立所有的监管制度，包括投资指南和提取制度。这一机构还需要管理违约投资基金并出售年金。为了赢得参加者的信任，政府必须同时保证个人帐户制度的透明和安全。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已经建立起严格的会计制度和信托标准，保护个人投资者的利益。中国才刚刚开始建立必要的保护制度。

中国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障碍。尽管在过去十年间的成长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股票市场仍然太小而且流动性差。在美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场值与银行储蓄存款之比为1.57 比1。但在中国，银行储蓄是股票市场总值的十四倍(见图17)。缺乏流动性，加上公司治理标准较低，会计标准不严格，助长了投机性质的投资文化。中国的债券市场更不发达。尽管财政部每年发行债券数千亿元人民币，中国的政府债券二手市场流动性更差。省市一级的政府还不允许发行债券为投资筹措资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动用个人帐户的资金是一种诱惑。企业债券的发行还要经过中央政府的严格审批，而且中央政府实际上制定了债券的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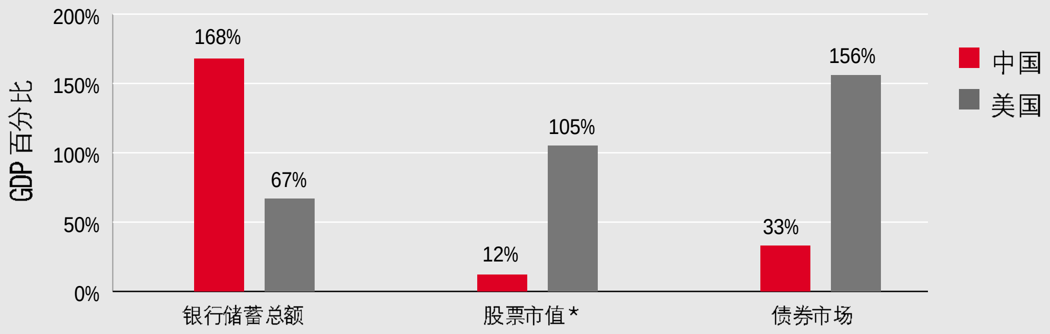
资本市场还缺乏其他一些特征。如没有一个权威的信用评级系统。没有指数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RA 和401(K)计划中都广泛使用。八十年代通过的破产法,目前基本上不发挥作用。最近几年，破产法修订案已经几易其稿，但因为担心会引发新一轮国企裁员和关并，政府一直未能通过。

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对于成功建立真正资金做实的制度起到关键作用

除了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也不成熟。中国公司几乎没有管理养老基金的经验，主要是因为政府垄断着这一生意。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将养老基金委托给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央政府却开始将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中的一部分盈余委托管理，但数目仍然微不足道。初始阶段，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对于一个成

中国银行储蓄仍然远远大于股票及债券市场

不同资产占GDP的百分比：中国与美国，2002 年



*中国股市仅计算可交易股票
来源: 中国证监会 (2004)和亚洲发展银行(2003)

图 17

功的个人帐户管理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当中国的金融市场按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开放时，国内公司开始学到“最佳惯例”。然而，这一过程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完成。

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迎接老龄化挑战的交汇点

因此改革将分阶段进行。最初，只有一小部分个人帐户缴费将被委托给独立的基金经理。资产选择也受到严格限制，也许仅限于政府债券。当资本市场成熟时，当基金经理们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时，独立管理的缴费份额可以扩大，投资限制也可以放松。假以时日，个人帐户缴费的份额会逐步增加，投资国内公司债券和股票市场，最终会进入国外证券市场。政府可能严格监督自由化的步调，避免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冲击。让养老金资产逐步进入外国资本市场，不仅仅令投资战略趋于完善，而且在将来放开资本控制时，会为政府提供一个控制储蓄突然外流的手段。

尽管中国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引入一个类似香港的个人帐户系统，如香港的基金，但中国却不能等到资本市场完全成熟以后才采取行动。实际上，引入一个做实的养老金制度可以确保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诸多今天的发达国家中，养老基金在扩大和深化资本市场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养老基金成长时，中国的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也会成长。职业化的基金经理，将会带来更大的责任、透明和长期的回报。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将是中国老龄化和发展交汇的起点。

老龄化的中国与老龄化的世界

中国如何对付老龄化挑战将决定今后半个世纪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果中国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退休政策，迅速发展的代价将会增加。如果它成功了，潜在的收益将会放大。的确，如果缺乏有效的养老政策，长远来看一个繁荣和平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广泛社会变革，已经被比做一个必须保持一定速度前行的自行车，否则就会倒下。出口、工资、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公共基础设施、有效率的商业资本、能源、以及住房，都必须跟上投资者和家庭对经济增长的期望。如果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失灵，整个经济就会垮掉。

中国的老龄化增加了这些压力。一方面，它令经济高速增长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职工人必须将其工资中更大的份额用于退休的老人，要么通过家庭，要么通过公共财政。另一方面，它会加剧高速发展的社会及政治危险。像许多发展中的经济一样，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现代化的阵痛。数千万人正从传统的乡村涌入喧嚣的制造业中心。从业 人员的流动和轮换正加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加大。社会服务残缺不全，公民权利仍然受到制约。这些阵痛在一个年轻的社会里是可以承受的，但在一个老龄社会里就难以容忍了。想象一下中国战后婴儿潮一代中很大一部分，其中有数千万人加入低收入而且没有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口，到了2020年和2030年间，他们成为数千万贫困的都市老人，缺乏家庭照料，没有养老保险，而且没有医疗保险。或者试想一下，在西部的农村地区，整个镇上的居民全都是老人。

如果不改革，中国很快拥有数千万贫困的老人，缺乏家庭照料、养老金、以及医疗保健。

在一个年轻的社会里，面对人口的多样化，人们的情绪是充满了希望。但在一个老年社会，处于同样的情况下，人们的情绪可能就是绝望。这种情绪的转变会产生政治后果，特别是当公众看到明天不堪负重的从业人员和陷入贫困的老人，他们会认为这个国家缺乏远见。

一个成功的养老政策改革可以抒缓这一危机。有一个保障所有老年人免于贫困的制度，老年人就不会担心中国过于沉重的家庭赡养网络会抛弃他们。有了第二层资金做实的个人帐户，不断庞大的老年群体将会展望一个舒适的晚年。劳动者也不必把他们的工资中前所未有的份额用于赡养老人。中国生活水平的变化将不再取决于人口转变。

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令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再受到人口的左右

成功的养老制度改革还有许多益处。如果老年人可以保证最低限度的养老金，年轻的工人们就可以出远门寻找更好的工作而不必担心他们年迈的双亲；年轻的企业家们将会发现冒险开办一个新企业要容易一些，而不必担心影响他们的老年安全；如果政府能明智地准备应付中国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变，其长期政治结果可以是加强公众的支持。

成功的退休制度将在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迟早都要建立深广的资本市场。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有数亿个家庭，今天往往把他们的钱投资于非生产性的住房或者存在银行里，银行因为坏帐问题无法解决，无法将这些钱贷出。但发展中经济需要产生有效益的资本。中国还需要一个深广的资本市场在不同的产业和商业之间有效地配置资本。

中国的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目前比一些资本主义经济还要自由。它的资本市场却仅仅从表面上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中国大部分资本仍然由政府通过国有银行分配。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没有一个行政手段可以让资本找到最佳回报。今天中国许多获国家青睐的大型的企业能获得充裕的资金，尽管他们可预期的回报很差。但许多有很好回报前景的中小企业却资金极度短缺。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足并没有明显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GDP的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的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市。乡下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原本根本没机会参与国民经济，现在他们从乡下涌入城市，找到全职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作，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随着民工进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甚至提供就业的公司也并没有利用资本市场(例如大型的和政治敏感的国有企业)或者主要依赖于国外资本(所谓的“制造业平台”)。

中国发展战略将会日益依赖其资本市场的作用。

然而，作为主要的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移民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取决于有了好工作的工人们找到更好的工作，取决于有稳固市场的公司通过创新赢得新的市场。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日益取决于其资本市场的活力。

一个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可以是产生活力的强有力手段。显然，许多制度改革要为此做出准备，包括通过立法更好定义个人和金融财产；法庭能够提供保护产权的执法程序；政府能改善经济数据的收集；专业化的监管及执行机构，保证金融市场上“公平”交易并保护投资者不受欺诈。一旦开始运作，数百万个人帐户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源泉。如果中国当前的个人帐户制度能做实，并将扩大到整个城镇劳动力，今年的缴费总额将达到2500亿元，约相当于目前可流通股票总额的20%。甚至其中的一小部分注入资本市场，都可以成为主力军。除了资金总量以外，个人帐户将能教育职工们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从长期来看，职工们将开始把他们看成是现存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会自觉地保护和代表这个制度，因为拥有财产的人总是支持现有政治制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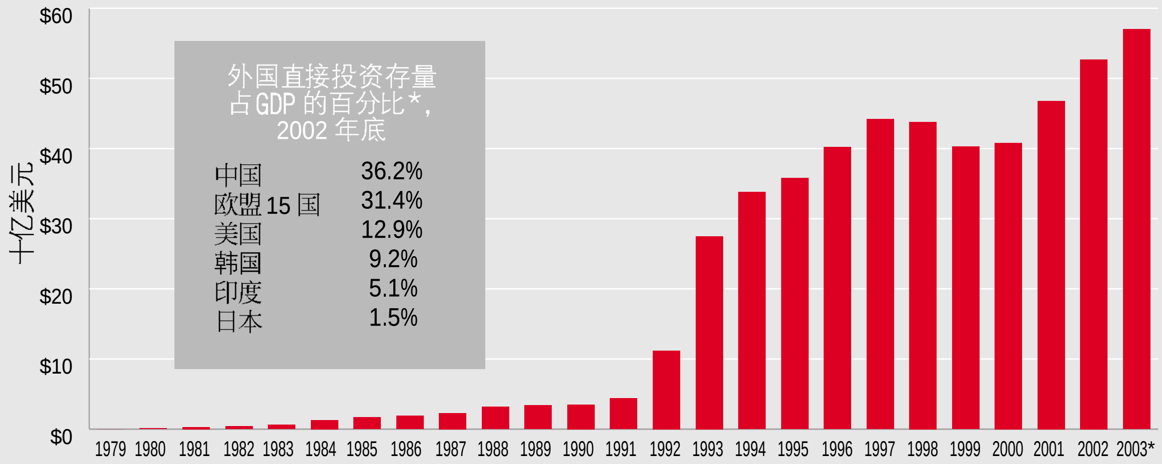
成功的养老制度改革将把中国引向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未来资本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强大的，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将保证更均衡的经济增长和在世界上更主导的作用。衰弱的和孤立的市场将会产生不均衡发展的经济，过于依赖国外借贷，在世界上的作用更小。成功的退休制度改革将有助于把中国引向更主导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所有的国家。

众所周知，全球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一代人之前，中国与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今天，出口的产品和劳务已经达到GDP的27%，以美元计中国成

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每年流入中国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十亿美元，1979 年至 2003 年



*初步估算

来源：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2004）和世界银行（2003）

图 18

为世界第六大出口国。如果按目前的出口增长速度，中国的排名将在五年内达到第四名，仅居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到 2002 年底，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 GDP 从 1990 年 7%上升到的 36%(见图 18)。按美元计算，2003 年流入中国的外资达到 570 亿美元，令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接受国。还没有一个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的主要经济曾这样快地融入全球市场，美国在 150 年前、日本在 100 年前、墨西哥在 50 年前、还有今天的印度，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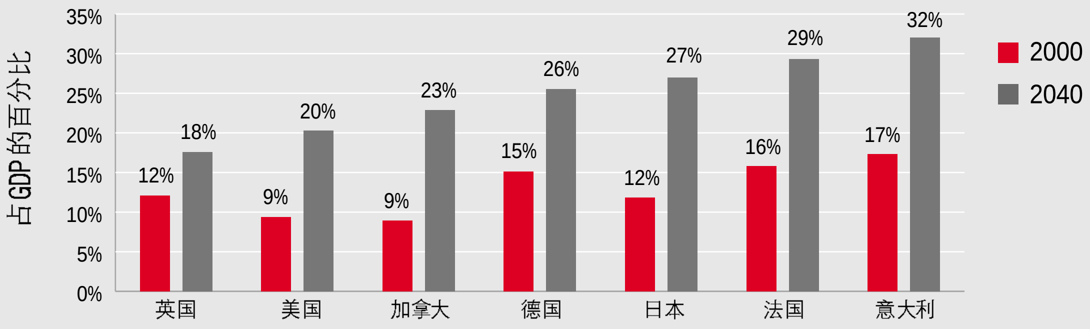
但长期依赖外国市场有局限性，特别是如果依赖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到最有创新和生产率最高的公司。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的高回报将持续归外资而不是中国人所有。它可能会限制新一代的专业人士、经理和企业家获得直接经验，正是他们可能提升中国人拥有的和中国人管理的公司在“创造价值链”的位置。与中国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一起，过于依赖外国出口平台使中国的劳动力和经济极易受到全球相对少数的出口产品价格的突然下降。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这一不景气可能会轻易被它自己的出口引发。

当发达国家衰老时，中国再依赖外资流入将变得危险

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后几十年能否得到外国直接投资。今天多数富国面临着高涨的老龄化浪潮，比中国的老龄化来得更早。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全球资本自然地从较老的发展较慢的发达经济流向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但是近几年这一理论已经引起质疑。尽管发达国家的投资需求将肯定下降，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变老，但退休家庭的急剧增加会削弱私人部门的储蓄供应。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都被长年累月的财政赤字困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个昂贵的

老龄化浪潮带来的财政负担，可能令今天的富国陷入经济困境

老年人(60 岁以上)享受的公共福利占 GDP 的百分比，2000 年及 CSIS 对 2040 年的预测



来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3)

图 19

现收现付退休制度和医疗福利，其成本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迅速攀升。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预测，在七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中，老年公共福利的平均成本，将从 2000 年占 GDP 的 13%，升至 2040 年占 GDP 的 25%(见图 19)。甚至如果他们大规模削减福利，多数国家也不能维持财政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无限制地依赖外国资本流入可能不仅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更不是一个可取的选择。中国今天有一个不大的经常项目盈余，但是仅仅是因为它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净流入被政府大规模地购买外国证券资产所低消。当它的经济成熟时，如果要保持均衡的发展，中国应该在未来十年年增加其经常项目盈余，并不是通过政府持续的干预，而是通过允许中国资本市直接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成为商业融资的来源。

这一政策，将要求中国建立更深更广的资本市场，还要求中国逐步但完全地开放其资本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中国投资者必须拿国内任何产业或的回报与国外同样的产业进行比较。中国公司必须学会分辨全球市场去寻找新客户，出口多样化，如果必需的话，对发达国家进行战略性直接投资。假以时日，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做实的个人帐户层面会证明是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数百万平凡的家庭将用个人帐户分散中国的资产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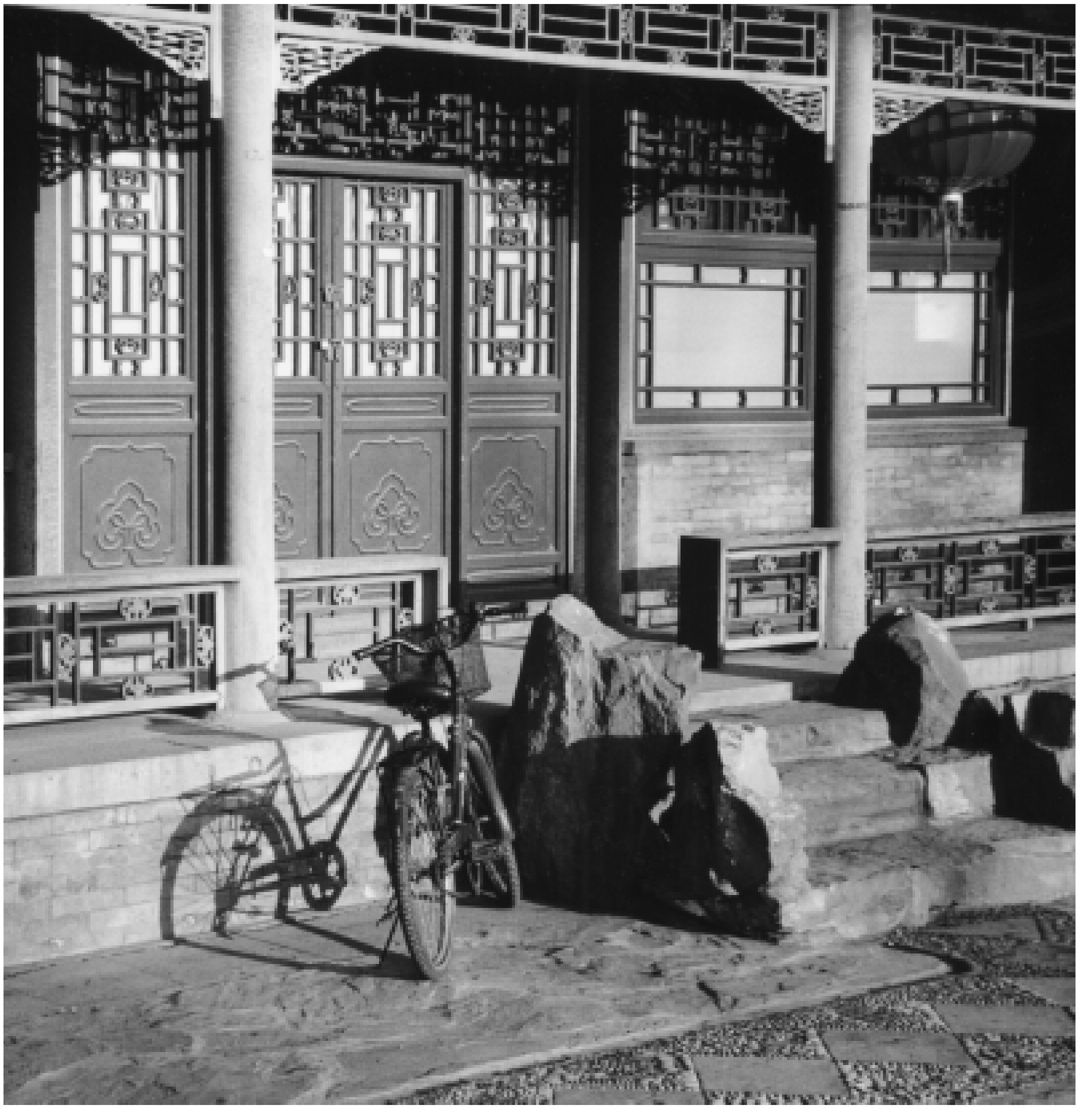
个人退休帐户可能帮助政府管理向浮动汇率的过渡

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将肯定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它会逐步地要求中国的汇率浮动。向一个浮动汇率转变反过来引起人们担心中国投资者在开始进入外国证券市场时，可能开始会引发人民币贬值。个人帐户能帮助管理这一过程，让政府控制中国的储蓄流向国外，例如，管理者可以逐步提高(或者冻结，必要的话)每个帐户中外国资产的最高比例。做实的退休帐户因而能够提供一个理想的手段，来监管这一转变，绝大多数政策专家相信这一转变迟早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整个世界都与中国的成功攸关

中国需要深化和扩大资本市场，以建立一个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如此才产生一个成功的养老政策。但它还需要一个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来造就更广和更深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发展战略最终有赖于资本市场。如果中国成功了，未来不仅老年人享受更舒适的退休生活和家庭也免于担心，而且资本生成更强、生活水平更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更坚定。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更成熟的作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巨大的非熟练劳工的集散地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值的经济。整个世界都能从这一前景获益。

目前的预测指出，在二十一世纪中期左右，中国将在年龄上赶上发达国家。那时中国可能不必为它在变富之前先变老而感到遗憾。如果它今天做了明智的选择，它会为老龄社会降临之前的未雨绸缪感到自豪。



关于数据及来源的说明

《银发中国》得益于广泛的资源，既有政府统计年鉴、学术论文、行业报告和报刊文章、也有与专家的讨论。这里指出最重要的数据来源和几个非常有用的研究成果。

绝大多数基本的人口数据和预测都来自联合国人口署并已经在《世界人口预测》中出版[18]。这些数据包括总人口、各年龄层人口、赡养率、中位数年龄、总生育率(不包括中国历史数据)、以及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联合国人口数据和预测的好处在于它便于国际比较。然而,该报告中的某些数据也直接来自于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或者来自于一些基于这些数据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总生育率[19]和性别比[20]的历史估计、流动人口的估计[21]、以及老年人生活安排的数据[22]。

除非另加说明，所有的人口预测都是联合国的“恒定出生率”假设。顾名思义，它假设各国的出生率在将来保持不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认为这一假设比通常所引用的“中位变量”提供了更好的基准。后者只是随意地假设出生率会趋同。在一些国家，这两种假设基本上是分离的。然而,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同。用中位变量法和恒定出生率法相比较，到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预测数仅有3%的差异。

中国经济的基本数据,包括GDP(总量和各经济部门)和家庭收入(总量和户口登记)，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3]。除了按年龄计算的参加率，中国劳动力数据(总量、按经济部门、及按户口登记)来自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及其出版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4]，这也是平均工资(全国及各地区)和失业率的来源。政府支出、收入和债务出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市场数据一银行储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分别出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以及亚洲发展银行。

国际数据出自不同的来源。GDP和人均GDP(根据汇率及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美元值)都来自世界银行[25]。按年龄的劳动力参加率出自ILO的LABORSTA数据库，可参见www.1aborsta.ilo.org。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及发展组织的FDI数据库，可参见www.unctad.org。贸易及资本流动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18.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2 volumes (联合国人口署，2003)
19. 计划生育统计简报(国家人口及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同年份)
20. 中国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3卷(人口统计办公室及国家统计局，2002).
21. 蔡昉，*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Insecurity: Patterns, Processes, and Policies* (ILO, 2003)
22. 曾毅和王正联，"Dynamics of Family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New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2000 Census," *The China Review,* III:2 (Fall 2003)
23.《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2003年及以往不同年份)
24.《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及以往不同年份)
25. 世界发展指标，2003(世界银行，2003年)

中国基本养老制度数据，包括覆盖面及资金来源(总量、地区、及企业类别)，都来自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及其出版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统计简报，多数数据可参见www.molss.gov.cn。农村养老制度来自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来自专题研究[26]。被视为社会保障一部分的医疗福利，其数据来自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及其出版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全国医疗支出的综合数据(总量及按资金源划分)由卫生部及由中国卫生经济研究所提供给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一些数据可参见www.moh.gov.cn。社会福利方面的数据，如“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及“三无人员”，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除了数据出处，在准备这份报告过程中，还参考了数十种中国人口、经济、及退休制度的专题研究。在此选出一部分，供感兴趣的读者探讨。

关于中国人口学，读者可以从三篇扼要的概述入手：Athar Hussa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见*World Development,* XXX: 10 (2002);乔晓春，"From Decline of Fertility to Transition of Age Structure: Aging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hina,"见*Genus,* LVII: 1 (2001年1月-3月); Nicholas Eberstadt, "China's Population Prospects: Problems Ahead," 见*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m,* XLVII: 1 (2000年1月及2月号)。关于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指导是*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2002)。

关于中国退休制度权威的及最新的总结还没有出现。但是，一些研究特别有帮助：高山宪之的 "Pension Reform in the PRC: Incentives, Governance, and Policy Options,"该论文发表于亚洲发展银行研究所五周年研讨会（东京，2002年12月5日-6日); Peter Whiteford的"From Enterprise Protection to Social Protection: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该论文出自Oxford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Workshop (2001年9月4日-5日);周永新的 *Socialist Welfa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香港大学，2000年）;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世界银行，1997）; *Financing Health Care: Issues and Options for China*（世界银行，1997）。

在许多关于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技术性研究中，有几篇值得在此提出。王燕、徐滇庆、王直和翟凡合写的"Options and Impact of China's Pension Reform: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即将出版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孙祈祥和John W. Maxwell, "Deficits, Empty Individual Accounts, and Transition Costs: Restructuring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Pension System,"见*Journal of Insurance Issues,* XXV: 2 (2002年秋); Estelle James, "How Can China Solve Its Old Age Security Probl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nsion, SOE, and Financial Market Reform,"文章见于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研讨会（2001年9月11日至13日）。

26. Peter Whiteford, “ From Enterprise Protection to Social Protection: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 文章发表于Oxford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Workshop (September 4-5, 2001); 以及赵耀辉和徐建国，“China’ s Urban Pension System: Reform and Problems,” Cato Journal, XXI:3(2002年冬季)

引证提要

亚洲发展银行(2003) = *Harmonization of Bond Marke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Selected APEC Economies*(亚洲发展银行;2003).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3) = Richard Jackson and Neil Howe, *The 2003 Aging Vulnerability Index*(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惠悦咨询公司;2003).

中国证监会(2004) = 中国证监会,中国股票市场价值主要指标(2004),见网址www.csrc.gov.cn.

国际劳工组织(2004) = 国际劳工组织,LABORSTA数据库,见网址www.laborsta.ilo.org.

劳动及社会保障部(2003) = 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

劳动及社会保障部(2004) = 劳动及社会保障部,2003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2004年2月16日),见网址www.molss.gov.cn.

国家人口及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同年份) = 国家人口及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统计简报》(不同年份)见网址www.sfpc.gov.cn.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2002) =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经合组织;2002).

大塚正修及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2) = *Impacts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Reform.*(大塚正修及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2).

高山宪之(2002) = 高山宪之,"Pension Reform in the PRC: Incentives, Governance, and Policy Options,"文章发表于亚洲发展银行学院五周年研讨会(东京, 2002年12月5至6日)

联合国(2003)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2 volumes(联合国人口署;2003).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2004) =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 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库,见网址www.unctad.org.

世界银行(2003) = 世界发展指标2003(世界银行;2003).

曾和王(2003) = 曾毅和王正联,"Dynamics of Family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New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2000 Census," *The China Review*, III:2(2003年秋季)

致谢

作者要感谢一些个人和组织对《银发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首先必须提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老龄化项目的研究助理中嶋圭介，对于作者来说，他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几乎每一方面所提供的帮助无法估量；还有周健工，他是一位中国金融市场专家和全球老龄化项目的顾问，他帮助作者解开了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迷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份报告的质量要大打折扣。作者还要感谢Paul Hewitt，全球老龄化项目前主任、现美国社会保障局负责政策的副局长，他首先启动了这一项目，而且他的真知灼见在报告中也有所体现。作者还感谢Robert England和Philip Longman的贡献，他们为这份报告的前期进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研究。

另外，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全球老龄化项目研究员Craig Romm，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这份报告。作者还要感谢实习生徐梓琳、Maira Vaca-Baqueiro、和Samantha Marussi。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Freeman基金主任Bates Gill和研究员Andrew Thompson都提供了建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行政副总裁Robin Niblett和公司关系经理Mana Zarinejad都提供了帮助。

作者感谢宝德信基金的慷慨支持。

作者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宝贵意见，作者要特别感谢肖才伟(中国老龄协会国际部主任)；Ken Davies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金融、财政及企业事务主管)；Mark C. Dorfman (世界银行高级养老金经济学家)；Nicholas Eberstadt(美国企业研究所)；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主任)；乔晓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Thomas G. Rawski(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教授)；Sylvester Schieber(惠锐咨询公司研究部主任);Yvonne Sin(世界银行高级养老金专家)；Peter Whitefor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劳动与社会事务主管)；赵玉欣(中国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教授)。

作者感谢他们在研究《银发中国》过程中所受到的帮助，并愿意承担这份报告中的一切缺点。

关于作者

RICHARD JACKSON研究及著述有关美国及全球老龄化所产生的公共政策问题。他目前担任国际战略及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全球老龄化项目主任，兼任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还是和谐联盟的高级顾问。JACKSON是众多政策研究的作者，包括《全球退休危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花旗集团，2002)。《老龄化指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惠锐公司，2003)，《德国和全球老龄化挑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NATIONWIDE GLOBAL,2002年)。JACKSON经常就人口及经济的长期问题发表评论并被报刊引用。他在奥尔巴尼的SUNY大学获取古典学士学位，在耶鲁获得经济史博士学位。他与妻子PERRINE、两个儿子BENJAMIN和BRIAN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利亚。

NEIL HOWE是一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他经常发表文章及演讲，涉及到人口老龄化、长期财政政策及历史分期。他是国际战略及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高级政策顾问、及和谐联盟的高级顾问。他还是集营销、人力资源和战略咨询于一体的LIFECOURSE ASSOCIATES的创办人之一，该公司服务公司、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他与人合著过《借来的时间》(1988)，《代》(1991)，《第13代》(1993)，《第四次转折》(1997)，《千禧年的崛起》(2000)。他从耶鲁大学取得历史和经济学的研究生学位。他与妻子SIMONA、两个孩子GIORGIA和NATHANIEL住在弗吉尼亚大瀑布。